

从“大全一体”通观西方哲学史

——先刚教授访谈

● 先刚 ○ 倪逸偲



● 先刚，1973年12月出生于四川泸州。1992—200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随后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于200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于2011—2012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从事访问研究。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主编22卷本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合编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迄今发表 *Schellings Idee der Weltalterphilosophie und seine Lehre von der Zeit* (2005)、《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2008)、《柏拉图的本原学说》(201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2015)等四部专著，以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2013)、《逻辑学I》(2019)和谢林《近代哲学史》(2016)、《哲学与宗教》(2017)、《世界时代》(2018)、《学术研究方法论》(2019)、《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2019)等七部德国古典哲学经典译著。在《哲学研究》《学术月

刊》《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即将出版的作品有谢林《艺术哲学》、陈康《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黑格尔《逻辑学II》等译著。

○ 倪逸偲，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 先教授，您好！您是我国谢林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您当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就以谢林哲学为主题，这十几年来研究也集中在谢林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领域。可否从这点开始谈谈您的治学兴趣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 我的治学兴趣完全是自发形成的。刚上北大的时候，我读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完全

被迷住了。按照叔本华在书中的指引，我又去学习了康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以及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甚至去东语系学习了一学期的梵文（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全忘光了）。另一方面，我在北大哲学系经受了严格的哲学史训练（当时的“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足足有8学分，是现在的一倍），认识到整全视野的重要性，这样目光就很自然地聚焦在哲学史的巅峰亦即德国古典哲学上

面。虽然叔本华痛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是骗子，但我读过他们的书之后，发觉事情并非如此，而且相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给我展示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精神世界和一套更有说服力的思想体系。于是，大概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之后就没什么根本上的转变了，只能说是不断地深化和拓展。

具体到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和本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样，我也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重，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没有忽略费希特和谢林。德国古典哲学是最强调系统完整性的，如果在四大家里面，只抓住其中两位甚至一位，然后草率对待另外几位，岂不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初衷？据我观察，人们之所以觉得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不重要，很多时候只是出于一种惰性，不肯去认真研究。我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又花了一些功夫去研究费希特和谢林。这也不是为了什么“填补学术空白”，而是我相信他们本身就值得去研究。在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我又更倾向于谢林，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总的说来更接近黑格尔。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谢林的自由学说，但当时其实还没有最终决定选择谢林哲学为将来的主攻方向。当初我去德国留学时，有图宾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两个选项，假若我选择海德堡大学，那么大概率会以黑格尔哲学为主攻方向。不过我最后选择了图宾根大学，而我的导师曼弗雷德·弗兰克教授又是顶尖的谢林哲学研究专家，所以这件事情就敲定了。到了图宾根没多久，弗兰克教授请我在一家小酒馆喝酒，谈以后的研究计划。酒过三巡，他突然说，有一个问题——谢林的时间学说——值得研究，这是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想做、但由于各种原因又错过了的题目（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国浪漫派的时间问题），希望我来做。老师既然这么说，我就接受了这篇命题作文。就这样，在德国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周末和假期，埋头于花体字版谢林全集里面，最终在30岁生日那天完成了《谢林的世界时代哲学理念及其时间学说》（*Schellings Idee der Weltalterphilosophie und seine Lehre von der Zeit*）这篇博士论文。在写作论文并与弗兰克教授反复交流的过程中，我才慢慢知道，原来他希望我从谢林那里挖掘出一种与黑格尔的逻辑性哲学针锋相对的历史性哲学，然而事与愿违，我诠释出的谢林哲学更像是黑格尔哲学的孪生兄弟，附着对弗兰克教授本人的谢林哲学诠释和他珍视的德国浪漫派多有批评。这个结果大出弗兰克教授的意

料，尽管如此，他非常宽容地对待我的独立思考，还偶尔在课堂上把我和他的分歧拿出来供大家讨论。今天回想起来，我要感谢弗兰克教授的“不杀之恩”，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仅仅由于观点分歧就被他毙掉的论文并非个案。

○除了谢林哲学研究，您也是黑格尔哲学翻译与研究的专家。可否谈谈您对于黑格尔哲学与谢林哲学之间关联与差异的理解？

●这个问题有点宏大。总的说来，谢林和黑格尔作为施瓦本同乡、图宾根同窗学友、耶拿大学同事，再加上时代背景方面（比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思想发展道路方面（比如康德、斯宾诺莎、费希特的直接引领）的共同经历，更重要的是，两人都以“大全一体”为旨归，所以他俩的哲学天然地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至于假如说黑格尔1801年的那本《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出于谢林之手，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诧异，更不要说他俩共同撰写的那些未具名的哲学论文。当然，黑格尔从1807年发表《精神现象学》之后就与谢林分道扬镳了，最后两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所以差异肯定是存在的。但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因为谢林和黑格尔都是我的挚爱，所以我更倾向于从融贯的角度看待他俩的关系，同时尽量就事论事讨论他们的分歧。我之前也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涉及他们的相互批评、艺术哲学的差异、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等，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果这里一定要下一个最根本性的判断，我认为黑格尔是绝对彻底的理性主义者，相比之下，谢林更愿意在本原的层面上为某种非理性的东西保留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当然，我这个评价和那些动辄把谢林贬低为“非理性主义”的说法是根本不同的。

○您谈到了谢林与黑格尔之间复杂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这也体现出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内部研究层次的复杂性。那么，我国学界应当如何梳理并把握这里面错综复杂的线索？

●对我国学界来说，要梳理并把握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纷杂的线索，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首先填补认识上的空缺，补强谢林后期哲学和费希特后期哲学这两块研究短板，否则我们就会永远囿于黑格尔主义者鼓吹的“从康德（经历费希特和谢林）直到黑格尔”这个僵化的教科书模式。在这些方面，我国学界相对德国学界还是有较大的差距。20世纪德国蓬勃复兴的谢林研究和费希特研究提出了后期谢林或后期费希特才是德国唯心论的终结者这一尖锐的议题，一时间从者甚众，虽然我觉

得黑格尔的立场仍然是可辩护的，但这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才是我们应当期待的，它对于我们更真实地认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本身）都有莫大的助益。除此之外，我一向主张一种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德国浪漫派也包揽进来的“大德国古典哲学”，在其中，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相当于“正”，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派相当于“反”，而谢林和黑格尔相当于“合”。这个是我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的主要研究课题。

○我们这个现代性世界与其伴生的现代社会越发体现出原子化与碎片化的特点，而这一切恰恰是与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所提倡的整体性精神背道而驰的。您可否更深入地谈谈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于回应现代性危机的重大意义？以黑格尔与谢林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当下意义？

●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与碎片化的根源是一种个人原子主义。但原子论古已有之，为什么就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呢？还有学者溯源到中世纪只认个别事物的唯名论。但我认为这都不是关键。因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不只是说把普通个别事物当作最真实的，而是把“我这个个体”当作最真实的。因此，真正的关键在于笛卡尔的哲学革命，他通过对于自我意识的极端强调以及对于自我之外的一切东西的怀疑乃至否定，把主观的自我推到了第一本原的地位。就像谢林说的，古人看问题的态度是，事情本身怎样，而从笛卡尔开始，现代人看问题的态度首先是，“对我来说”，事情是怎样的。在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又决定性地火上浇油，他不但主张单子（即“原子”或“个体”，二者在字面上是完全一样的意思）的本原地位，而且论证了单子只能是精神性东西（因为物质性东西是无限可分的，从而与不可分的“个体”相矛盾），即自我。这种以“个体—主观自我”为第一本原的哲学在实践上就表现为支离破碎的个人原子主义，再包装上“自由”“权利”等让人立即肃然起敬的概念，成为人们最大的信念，相应地，那代表着整全性和普遍性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秩序反而成了某种虚假可疑的，或至少是派生的、次要的东西。这种个人原子主义也导致了所有层面的分裂式对立，基本上现在你能想到的各种对立，都在现代社会里有最极端的表现。

现在问题来了，人们都不喜欢个体的无限膨胀导致的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称其为“危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现代性的这个最高原则亦即“个体—主观自我”及其“自由”和“权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随之

认为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倡导整体性的哲学是反动派。我为什么不提康德和费希特呢，因为这两位虽然也强调整体性，但他们对于主观自我的推崇总的说来是给现代性精神推波助澜的。我想说的是，谢林和黑格尔的逆流而动绝不是单纯的“复古”，正相反，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并且承认主观的个体性（或者说个体的主体性）的崇高地位及其深远的积极意义，只不过——这是他们和近代所有别的哲学家根本不同的一点——他们不承认这是最高本原，而是指出其依赖于本质上的同一性，后者才是第一位的东西。简言之，就是要在一个以普遍理性为主宰的大全一体式整体里给现代性精神指派一个正确的地位。刚才提到的莱布尼茨其实本意也不是要提倡个体原子主义，正相反，他强调的是单子之间的交互映射的前定和谐，只不过他的单子论过于玄幻，听起来像“童话”一样（罗素语），不像是在讲道理。反之，黑格尔和谢林却是以透彻的、严密的论证建构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这个整体不排斥甚至欢迎一切分裂和对立，但“理性的狡计”会纠正并消弭这一切。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哲学思想，当然会在现代社会里找到更好的安身立命的办法。

这就是我对于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当下意义的看法。我感到遗憾的是，西方社会虽然早就拥有这样一剂医治其顽疾的药方，却因为其苦涩而不肯下咽，甚至咒骂它是毒药。如今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通常说来，中国哲学更接近于古代西方的和谐理念，缺少分裂和动荡的环节，因此需要接受来自西方的、代表着现代性精神的哲学的冲击和撕咬，当然也需要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来修弥其创伤，并帮助其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大全一体。

○德国古典哲学是新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之一。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或多或少出现了“重康德而轻黑格尔”或是“重黑格尔而轻谢林”的倾向，可以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吗？您对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下一步发展又有何期待呢？

●基于自然的精力分配和个人旨趣，加上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学术研究有所侧重是非常正常的。不太正常的则是出于一些偏见和成见，肆意褒贬，在哲学家之间制造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局面。你说的这两种倾向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曾经一直是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最强大的传统，但具体到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得到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黑格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所以

这里不单单是“重黑格尔而轻谢林”的问题，康德和费希特同样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然而恰恰是这种教条主义，催生出改革开放至今的“重康德而轻黑格尔”的逆向倾向，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之后，学界把长期受到压抑的对于僵化意识形态的不满全都发泄在黑格尔身上，转而推崇康德。在这个转换中，谢林由于其曾经的黑格尔批评者的身份偶尔会受到表彰，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仍然是被当作黑格尔的“同党”而一并遭到批判。

关于黑格尔和谢林的关系，刚才说了一点，但这个问题相比起黑格尔和康德的关系就没那么急迫了，所以我在这里主要谈谈我对“重康德而轻黑格尔”这种倾向的看法。这种倾向最初主要是基于一些情绪上的反叛因素，但在后来的演变中也越来越自觉地寻求学理上的支撑。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重提康德对于人类理性和知识的“限制”，指责黑格尔的“僭越”，另一方面把现代性最珍视的一些口号（比如“启蒙”“科学”“自由”“尊严”等）算作康德最大的功绩，转而攻击黑格尔是与之对立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之类。前一方面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完全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康德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基本上人们只需要认真学习一点黑格尔的哲学就可以自然解毒，但即使固守康德的立场，还是可以和黑格尔哲学和平共处的。但后面这个论调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经常脱离学术研究的范围，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如我们所知，（本真的）黑格尔研究在某些西方国家几乎要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了，幸好在中国不用担心这一点，毕竟黑格尔还是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实际上，很多赞美康德或咒骂黑格尔的论调是建立在对两位哲学家有意无意的曲解之上，我们不要忘了，罗素因为康德强调“义务”和“服从”而把他同样列入“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名单，反之真正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都知道，诸如“自由”“个体”等概念在其中占据着何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如果以断章取义乃至道听途说的方式去了解他，当然可以得出随心所欲的结论，但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从哲学的层面来看，我是站在黑格尔一边的，因为我认为康德通过其独一无二的先验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在更高程度上强化了笛卡尔以来的分裂式二元论，而且给这种分裂状态披上合法性和神圣性的外衣，把它美化了。这就催生出理论研究中的许多懒于思辨，却以坦诚自己的“无知”为美德的人，以及实践生活中的一些喜欢空谈真善美的道德先生，他们凡事先抢占道德高地，

然后对现实世界横加鞭笞，总是带着教训的口吻用各种“应当”去训诫世人。但即使从客观的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我也反对当前“重康德而轻黑格尔”的倾向，因为黑格尔研究者都很重视并且比较熟悉康德，反之很多康德研究者对黑格尔可以说一无所知，甚至不觉得这有什么欠缺。结果就是，在黑格尔研究兴盛的时期，康德研究并没有落后多少，反之在近三四十年以康德研究为主导的时期，黑格尔研究却是急剧凋零，发生了代际断层，以至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学者里，高水准的黑格尔专家寥寥无几，这和同时期人才辈出的现象学研究简直有天壤之别。优秀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学者的匮乏导致很难吸引学生到这个方向，而那些自发地有志于黑格尔研究的学生又常常陷入苦无良师的窘境。这是很糟糕的恶性循环。虽然费希特哲学研究和谢林哲学研究一直已是这个状态，但连黑格尔哲学研究也沦落至此，这个局面就很危急了。单靠康德研究是带不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更何况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三位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康德批评者和阐发者缺席的情况下，康德研究也会缺乏问题意识和推进的动力，这对于它本身也是不利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发展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尽可能的全面和均衡。只要我们真正去学习和研究了，自然就会消除那些偏见和成见。

○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领域之外，您也深入涉足了古希腊哲学研究，并首次将“图宾根学派”的德语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介绍进国内学界。可以就此谈谈您为什么会将研究兴趣引申至古希腊哲学，以及在您看来，打通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对于我国学界具有怎样的意义吗？

●正如之前所说，在叔本华的影响下，我对柏拉图的关注其实还要早于对谢林和黑格尔的关注。和现在在很多喜爱柏拉图的学生一样，当时的我虽然读了柏拉图的主要著作和一些研究文献，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知识掌故增加了不少，但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收获，无非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大路货思想。后来重新投入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我去图宾根，在那里接触到图宾根学派解读柏拉图的方法（从形式上看是重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从实质上看是在柏拉图那里重建一套系统的本原学说），一下子把堵塞多年的思想管道疏通了。所谓必然的因素，就是我当时已经基本掌握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突然发现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和他们的哲学有着极

大的相似性和明显的承继关系，所以接受起来毫无困难，而且越琢磨越有道理。有了这个突破，古希腊哲学对我来说就不再只是多出一个研究领域而已，而是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我沿着柏拉图和谢林—黑格爾的本原学说的思路进一步学习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整个哲学史地图对我来说也愈来愈清晰了。当然我必须承认，中世纪哲学仍然是我的一个短板，但就我对它的有限认识来看，这一块同样可以和谐地嵌合进去。

基于这些研究，我在《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一书和多篇论文里阐发了图宾根学派的思想。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和很多领域一样，主要是受英美学界的影响，如果能了解一下图宾根学派这个极具德国学术传统特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气息浓厚）的解读方式，肯定不是坏事。这些年下来，令我欣慰的是，图宾根学派的解读虽然在国内学界仍然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也陆续得到了部分专家学者和学生的关注。曾经有人说我在“贩卖私货”，大概指我的柏拉图诠释融入了很多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尤其是黑格爾的辩证法），而图宾根学派的前辈学者们在这方面要保守得多。但这岂非恰恰意味着我的柏拉图研究的某种创新和突破吗？大家总是说研究哲学不要只是“照着讲”，还要“接着讲”，我就是遵守了这个教诲。当然，我刻画出的以本原学说体系和辩证法为核心特征的柏拉图形象确实不太迎合当前主流学界的口味，迄今对我的柏拉图著作的六七篇书评也是以批评为主，但这些批评显然比“贩卖私货”这样的评价更值得欢迎。

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打通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意义，因为无论是打通古希腊哲学与 XX 哲学，还是打通德国古典哲学与 XX 哲学，都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最关键还是要对“哲学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我们学习哲学史不是为了获得一大堆知识掌故，而是为了掌握柏拉图所说的那种“通观”。关于这个“通”，我的理解是，在历史中思考哲学问题的形成、演变、分化和统摄，以消弭固守在个别哲学家立场上的片面理解，进而对这个问题本身获得一种透彻的认识。这是一个理想境界，从古到今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谢林和黑格爾，或许还可以加上海德格爾。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位普通学者就放弃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您在哲学翻译领域可谓著作等身，可否介绍一下您发起主持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动因与项目进展，

以及黑格爾著作的翻译情况？此外您在黑格爾《精神现象学》中译本的前言中曾提出，您希望通过哲学翻译来让黑格爾“说汉语”，那么您如何看待哲学翻译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张力？又如何看待哲学翻译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我翻译谢林著作的动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缺少谢林著作的中译本。先前，康德和黑格爾，甚至费希特，早就有了较为完备的中译著作集，唯独谢林是个例外，因此他在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里面也是最弱势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不谈历史上和学术上的原因了，仅仅指出这个事实。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界的前辈们无暇从事这项工作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个局面。对我个人来说，这事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我在主持谢林著作集翻译之前已经在国内发表了两部谢林专著，但很快发现自己基本上在自说自话，别人只见我把谢林吹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谢林本人究竟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也没法验证我的诠释究竟是对是错、有没有道理或是不是在“贩卖私货”。学术研究是一项共同事业，不能陶醉在自己一个人的王国里做国王。所以在写作《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时，我已经有意识地翻译了谢林的《哲学与宗教》作为附录，让读者既能看到我的诠释，也能亲自参照谢林的原文进行独立研究。这之后我主持的 22 卷本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就迅速上马了，从 2016 年至今已经出版了 8 卷，接下来预计每年出版 2 到 3 卷，争取到 2025 年出齐。这套谢林著作集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负责其中一半亦即 11 卷的翻译工作），译者团队还包括几位新一代杰出的谢林专家和在这方面学有专长的学生，这为整套书的高水准提供了保证。

至于我翻译黑格爾，背景就简单得多。2005 年张世英先生主持 20 卷本中文版黑格爾著作集的翻译工作，把各个卷册都分配完了，只留下一本《精神现象学》，据说原因是大家认为贺麟和王玖兴的旧译本太完美了，没有必要重译。张世英先生觉得事情未必如此，但当时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重译这本书，就搁下了，直到遇到刚回国年轻气盛的我，聊过一次之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在整套著作集里最先完成并出版了《精神现象学》。对于我这个译本的质量，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后来译者团队出现变动之后，又把《大逻辑》（即《逻辑学 I》和《逻辑学 II》）和《小逻辑》的翻译任务托付给我。只可惜张先生已于前不久仙逝，没能看到他主持的这项大业的完成。

这几年下来，我翻译出版了好几本原典。有好心的

师友担心我翻译速度太快以至于质量不保，但这个“快”对于一位勤奋用功的学者来说岂不是很正常吗？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用来工作罢了。实际上，我的翻译都是利用平时的边角料时间加上寒暑假的突击而完成的，若非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缠身，我还可以更快一点。再者，我的德语水平能够让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遍阅读就无障碍地理解了原文并想出对应的中文表述。

关于翻译这件事情，人们已经详尽地指出其各种缺陷和不便。但能不能因此就不翻译了呢？当然不可能。像哲学经典这样的人类思想精华，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分享的，因此我们这些西方哲学研究者有义务去从事翻译，至少必须有人去做这项工作。你外语再好，再怎么原汁原味地阅读外文原著，但只要属于中文学界，就必须把你的思想用中文表述出来，这不仍然是一种翻译？因此真正的关键在于怎样做好这件事情。所谓“张力”，或者说哲学翻译的困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无非是概念术语体系的转化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哲学概念（比如“Sein”）没有精准对应的中文词语，有些在译为中文之后失去其丰富的含义。但首先，没有精确对应的中文词语，我们可以创造一些词语，或用多个词语去传达其意思。其次，这些概念即使在西方语言自身之内，其丰富的含义也经常被忽视，而我们除了进行翻译之外，也有相应的研究和诠释尽量还原这些意义，所以归根结底并不存在什么“不当译”或“不可译”的问题，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西方人能思考的问题，我们一样能思考。

余下来的困难，纯粹就是译者的语言水平（外语和中文）和理解能力的问题了。很多中译本（连带翻译本身）之所以遭到非议，完全是因为译者至少在其中一方

面不过关。我提出要通过翻译让谢林和黑格尔“说汉语”，其实首先强调的是要让这些哲学家“说人话”，也就是说，要让读者读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在说话。德国古典哲学原典的确很难，但主要是难在思想上，其表述是很正常的。我认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就在于能够用中文把哲学家正常说的话准确地传达过来。但这里的“准确”不等于“硬译”，因为通常说来，硬译是语言水平和理解能力或其中之一有所欠缺的标志。这个做过翻译的人都懂。

至于哲学翻译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只需参考一下汉译佛经对我们的意义就清楚了。没有对印度佛学的消化和吸收，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宋明理学。古人遭遇我们现在抱怨的所有困难，但他们给我们完美地展示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和意义绝对不亚于佛学，而黑格尔说过，不能用母语来思考和表述哲学问题，等于没有掌握哲学。哲学本身看上去在西方已经没有出路，中国才是其未来可以栖身的家园。所以我们的翻译和诠释工作还需要继续推进，直到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自身的一部分，而中国哲学也将因此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层次。

○ 从古希腊哲学的“本原”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绝对者”，在这基础之上，您对未来的研究有何展望呢？

● 我其实是一名非常传统守旧的学者，可能在当前热衷于新思潮和国际化的大环境下显得有点特立独行。我迄今的研究和翻译都是一些很基础性的工作，目的在于守护、传承、弘扬我崇信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德国人或西方人，而是仅仅为中华文明服务，所以未来如果能力所及，我希望能够参与到中国哲学自身的重塑和建构之中。

（责任编辑：盛丹艳）